

试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孙海根 杨黎华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它全部内容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方面是怎样概括出来的，它们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想就这个问题谈点粗浅的体会。

(一)

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它体现着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这一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光辉的科学概括，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

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无论是民主革命的斗争，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斗争，都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它和整个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一样，贯串于其中的基本矛盾是主观和客观的矛盾，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在解决这一基本矛盾的时候，是从本本出发，把现成的公式、定义作为革命斗争的指针，还是从复杂多变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找出客观的规律，作为行动的向导？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想和态度，并且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斗争过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照搬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公式，自愿地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

误，使革命遭到了失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又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又使革命受到惨重的损失。在抗日战争时期，党和毛泽东同志系统地总结了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从世界观的高度批判了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指出，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其表现形式虽不一样，但它们共同的思想特征都是主观同客观相分裂，理论和实践相脱离；必须坚持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实际情况决定我们的方针，才能把革命推向前进。主观与客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也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区内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可见，毛泽东同志正是在深刻地总结我们党解决主客观矛盾，处理主客观关系问题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概括，并且对实事求是的思想作了精辟阐述的。

毛泽东同志把坚持实事求是与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党的立场紧密地联系起来，阐明了无产阶级立场、党的立场同实事求是的科学

态度的一致性。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革命最进步的阶级，它的阶级利益和阶级要求是同社会发展的方向完全一致的，它肩负的历史使命就是要领导人民群众去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和胜利地改造客观世界，也就是实事求是地把握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所以，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党的立场，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者，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为了革命的利益，都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在一切实际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也就是坚持党的利益，也就是党性的表现。相反，主观主义则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的，是共产党的大敌，是无产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主观主义害己，害人，害革命，只有打倒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

毛泽东同志深刻地阐明实事求是是一个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辩证过程。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解决好主客观的矛盾，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是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在分析这个过程的时候，他从认识的源泉、动力、检验的标准和目的等方面全面地、系统地说明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毛泽东同志指出，从总体上讲，各种知识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人们要获得知识就要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但不等于参加了实践就一定会得到正确的、深刻的认识。为此，就必须对从实践中获得的丰富的感性材料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这样，才能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过程中的第一次飞跃。然后，再将得到的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中去，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对认识进行检验和发展。这是认识过程中的第二

次飞跃，也是意义更为重大的一次飞跃。一个具体的认识过程是这样，整个人类的认识过程也是这样。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每一次循环都使人的认识达到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人类认识的总规律。把握人类认识的总规律，在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过程中做到实事求是，就要充分发扬人的自觉的能动性，积极地参加实践，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要不断地分析新情况，研究新问题。而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都是思想上的懒汉，他们或者躺在书本上，或是躺在现成的经验上，拒绝具体地分析实际情况，因而也就根本不能做到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毛泽东同志还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阐明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是同坚持辩证法完全一致的。实事求是就是要深入实际，分析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认识矛盾的特点，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又是各各特殊的。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不仅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而且特别深刻地阐述了矛盾的特殊性，强调要在矛盾普遍性原理的指导下，对特殊的具体的矛盾进行深入的分析，要分析不同的运动形式、不同的发展过程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的矛盾特殊性，分析同一矛盾不同方面的矛盾特殊性。总之，要深入地、全面地分析特殊的具体矛盾，反对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要具体矛盾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特殊的矛盾，才能根据矛盾的不同性质和情况，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对症下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具体分析具体矛盾的过程，也就是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过程。离开了辩证法，离开了具体分析具体矛盾，也就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

毛泽东同志不仅从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方面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而且非常注意哲学的普及化，群众化。他强调要让广大党员和群众都懂得实事求是这条思想路线，使它真正成为广大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的精神武器。“实事求是”这个成语，在我国古已有之，它的本意是讲研究学问的时候，要掌握事实根据。毛泽东同志吸取了其中的合理思想，并赋予新的内容，把它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紧紧联系起来，对“实事求是”作出了新的解释。他把深刻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用“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加以概括，这个概括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又具有民族的特色，因而也就容易为广大群众所理解，所掌握。他为了使全党都懂得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不仅在自己的著作中反复地对这个问题加以论述，而且还倡导通过整风的形式，在党内开展以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为主题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可以说，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提倡，经过党长期的宣传教育，“实事求是”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逐渐成为广大群众思想和行动的指南。毛泽东同志把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的哲理通俗化、群众化、普及化，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大贡献。

党和毛泽东同志所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仅具有深刻的科学内容，而且具有民族的、大众的形式，所以它能深入到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去，成为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唯一正确的思想路线。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同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项成就，如《决议》所列举的建国三十二年来的十项伟大成就也都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取得的。相反，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些失误，包括毛泽东同志本人所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这种长期性、全局性的错误，追根求源，也是由于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造成的。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下，党的三中

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方针，重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权威。在这条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步骤，从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纠正左倾的错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决地果断地按照中国的具体国情作出决策，妥善地安排了党的各项工作，从而使我们的国家出现了一个大好的局面。

(二)

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我们在处理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我们党在革命斗争中所遇到的另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党群关系问题。中国革命不仅面临着十分复杂的情况，而且面对着非常强大和凶暴的敌人。在旧中国，根本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可以利用，这给革命力量的聚集和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在这种条件下，党依靠什么力量去夺取敌人的阵地，并最终推翻敌人的统治？这是革命所面临的一个最尖锐的问题。马克思有句名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摧毁敌人统治的最强大的物质力量，不是枪，不是炮，而是觉悟了的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

有的人在口头上也讲历史唯物主义，可是一接触到实际问题就把它抛在一边。陈独秀和王明就是这样的人物。陈独秀的两只眼睛只是死死盯着资产阶级，处处依靠资产阶级，他抛弃了农民，压抑农民运动，结果，使无产阶级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王明不分青红皂白地提出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更为荒唐的是他把中间派当成“最危险的敌人”来对待，把革命的朋友推向了敌人的一边。无论是陈独秀，也无论是王明都没有找到摧毁敌人统治的物质力量。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

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明确指出，现阶段中国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深受三大敌人的剥削和压迫，有强烈的革命要求，而且，由于旧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很落后又很不平衡，中国革命只能采取长期的武装斗争的形式，走由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此，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最广大的同盟军，是革命的主力军。因此，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有所区别，它具有两面性，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程度上可以参加革命。尽管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很少，但有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同盟军，就可以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形成摧毁敌人统治的强大的物质力量。

党为了把广大群众真正地、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就必须妥善地处理好党和群众关系。在这方面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毛泽东同志把些宝贵经验加以理论化、系统化，并用党的“群众路线”这四个字加以概括。

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一切为了群众，这是党的各项工作的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就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立场。他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是我们共产党人与其它阶级政党相区别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正因为我们党自觉地把自已当作为群众谋利益的工具，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因而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一切为了群众，保持与群众最紧密的联系，这是我们党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源泉。一切为了群众，就是一切都要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群众既有长远的根本利益，也有眼前的切身的利

益。毛泽东同志告诫我们，不但要为群众长远的根本的利益而奋斗，同时要无微不至地关怀群众眼前的切身利益。党在领导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斗争中，不仅要领导群众取得斗争的胜利，而且要给群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党要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使他们看到长远的目标和根本的利益，还要关心群众的一切实际生活问题，如穿衣、吃饭、住房、柴米油盐、疾病卫生、婚姻问题等。总之，群众的一切实际问题都是我们党应当注意的。只有党关心群众的疾苦，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群众才能切身感受到党的温暖，提高对革命的认识，衷心拥护党的事业。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我们党的各项工作都要依靠群众，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的领导作用就是给群众指明前进的目标，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而革命和建设的目标，归根结底是要依靠人民群众自己去实现的。他经常告诫我们，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只要我们依靠群众，坚信群众的创造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和群众打成一片，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他强调我们党的一切工作都要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他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循环往复，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这里，毛泽东同志精辟地论述了群众路线既是党的工作路线，又是党的认识路线，他把这两者有机的统一起来了。群众既是实践的主体，又是认识的主体。我们党改造世界要依靠群众，

同样，党认识世界也必须依靠群众。党的群众路线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致性。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它贯串于党的全部实际活动中。毛泽东同志把群众路线应用于党的各项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例如，在政治方面，他提出了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口号，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在军事方面，他提出要建立一支同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的人民军队，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倡议实行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发扬政治、经济和军事三大民主，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在经济方面，他提出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在企业管理上要实行“两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指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便团结广大群众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在文化方面，他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问题，文艺工作者要与工农兵相结合，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兵服务，要到工农兵这个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中去吸取养料；在党的建设方面，他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要求全党与群众保持紧密的联系，如此等等。

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路线，在党领导的革命实践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子，并充分显示了它巨大的生命力。实践证明，这条路线愈是被广大党员和党的干部所掌握，党的事业也就愈加兴旺发达，革命的进展就愈迅速。民主革命的经验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鉴于群众路线如此重要，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刘少奇同志在这次大会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以及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都着重地谈了这个问题。

党的七大和八大所通过的党章都把群众路线作为全党必须遵循的准则明确地规定下来。

（三）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也是我们党处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关系问题上的深刻总结。我们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它所解决的矛盾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如何处理好这两个方面的关系，这是我们党在革命过程中所遇到的又一个突出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列宁都作了原则性的指示。他们既讲了各国的共产党人要善于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和自己的经验独立地解决本国的革命任务，又讲了各国无产阶级为了共同的利益要采取联合的行动。在当时的条件下，鉴于无产阶级面对着强大的国际资本势力，无产阶级缺乏斗争经验，无产阶级政党还不够成熟，在工人运动内部还存在着各种机会主义派别，为了引导工人运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对外抵御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对内摆脱机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支持建立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的倡议，并强调各国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采取统一的行动。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在我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对我们党的建立，对于中国革命的进程，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共产国际中某些人由于片面地强调统一领导，而又不太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出了一些不合乎中国实际情况的主意，对我国革命的进程起了一定的消极作用，这也是无可讳言的。王明的左倾错误就和这种消极作用有联系。王明根本无视中国的具体情况，不调查，不研究，以“钦差大臣”自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

产国际的决议绝对化，把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结果，招致了严重的失败，几乎使革命陷入了绝境。

毛泽东同志同王明的错误倾向进行斗争，并总结了这方面的教训，精辟地阐明了独立自主的原则。早在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他说，共产党的正确的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也就是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而中国的同志生活在中国的环境中，接触中国的实际，对中国的情况最为了解。因此，只有依靠中国的同志才能找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当然，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的，然而，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对待外国的经验也是如此。我们要认真学习别国的经验，一切国家好的经验都要学，可是学习一定要有所分析，要学习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对我国有用的经验。1956年，他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时指出：“我奉劝诸位，切记不要硬搬中国的经验。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不仅中国革命的道路要靠自己去寻找，而且中国革命任务也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这是我们党在处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相互关系问题上所得出的一条重要结论。在帝国主义时期，任何一场真正的人民革命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都离不开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的支持和援助。我们希望和争取外部的支持和援助，可是，我们不能依赖它，而是要依靠自己，依靠人民群众的创造力。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刚刚投降，蒋介石就想下山摘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果

实。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提醒全党，要警惕蒋介石发动内战。如果他发动内战，依靠什么力量把他打败呢？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不能学蒋介石。蒋介石是依靠美国的帮助，把美帝国主义作为他的靠山，处处依赖美国。我们要把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这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 and 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要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去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回顾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们战胜各种困难的一个法宝。建国前后我们党所遇到的几次大的困难，都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克服的。例如，1941年到1942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军事上集中兵力对我解放区进行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在经济上实行严密的封锁政策，这给解放区军民造成极大的困难，弄得我们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药，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可是，在党的领导下，解放区全体军民依靠自己的力量，组织起来，厉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终于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大家知道，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的严重经济困难也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引下克服的。

事实证明，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都必须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象我国这样人口众多，疆土广阔的大国尤其要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否则，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把这个问题提到世界观的高度加以论证。他说，唯物辩证法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和他事物的关系上去研究事物的发展。而事物发展的第一位的、根本的原因是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即事物外部的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唯物辩证

法要求我们如实地把事物的发展看成是事物内部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自然，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外因是要起作用的，但外因只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是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内因论，而教条主义错误的哲学根源之一就是主张形而上学的外因论。

(四)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宝贵经验的结晶，是党和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于中国具体实践中所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这三条之所以构成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因为它们是贯串在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渗透和贯串于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份之中，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是我们党观察和处理各种问题的指导方针，对于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首先，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三条是关系到革命和建设的全局性的问题。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一个由多种矛盾所组成的整体。在这个复杂的矛盾统一体中，各对矛盾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有的处于大局的地位，在整个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的处于小局_的地位，作用就不很突出。而主观和客观，党和群众，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各国的具体实践，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这几个矛盾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全局具有举足轻重，事关大局的作用。对这几组矛盾的处理，如果党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那么就能从全局上保证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至少保证不会发生大的失误。反之，就会给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回顾我们党六十年的战斗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建国前后的几次大的失误，都是由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没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所造成的；而一旦吸取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重新按照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指导方针办事，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其次，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三条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无论革命和建设，也无论是那一条战线，那一个地区和部门都会遇到以上所说的几个矛盾。而解决这些矛盾的唯一正确的方针只能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可以说，这三条是我们搞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指导方针。对于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人们比较熟悉，毋庸赘言。就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来说，它对各条战线，对所有的地区和部门，确有普遍的指导作用。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除台湾外有二十九个省市，国务院有几十个部门。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各个省市之间，各个部门之间互相合作，互相支援，互相促进，这是每一个省市、部门搞好工作不可缺少的条件。然而，对于各个省市和部门来讲，工作搞得如何，关键性的问题还在于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善于根据自己的特点，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本地区、本部门的问题。

再次，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长期起作用的方针。主观和客观，党和群众，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各国的具体实践，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矛盾是长期存在的，因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方针也决不是短暂的，而是长期起作用的。过去我们搞革命斗争，要解决这些矛盾，要遵循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方针，现在，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仍然要处理好这些矛盾，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方针。当然，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上述那些矛盾的具体表现也发生了变化。在旧中国，对我们党来说，主客观矛盾主要表现在

我们党在制定路线和政策的时候，如何做到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客观实际出发，从中找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来。今天，虽然我们的国家已经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可是，总的来说，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和科学技术都比较落后。现阶段，对我们党来说，主客观矛盾主要表现在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候，如何切实做到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找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为此，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以往比较，党和群众之间的矛盾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党已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在国家机构中担负着领导的责任，党的各级干部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容易滋长骄傲的情绪，在一部份同志身上会出现官僚主义作风，有人甚至利用人民给他的权力谋取一己的私利。对于这些不正之风，群众是很有意见的，这就是现阶段我们要特别注意解决的党群之间的矛盾。今天，无论从解决上述的党群之间的矛盾来讲，也无论是从实现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奋斗目标来讲，都必须十分强调恢复和发扬党和群众紧

密联系的优良作风，认真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在过去，我们党只是和共产国际以及为数不多的几个兄弟党有较多的联系，总的来说，对外关系是比较单纯的。而今天，我们的党和国家的对外关系就广泛多了。我们不仅同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而且同世界上的许多政党和组织，同第三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交往，同它们建立了多种形式的联系，包括引进外资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文化交流等等。今天，我们在处理如此广泛而又错综复杂的对外关系中尤其要注意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解决上述几种不同的矛盾所提出的方针。然而，这三条重要的方针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现，都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具有中国的特色，它们是毛泽东思想中最本质、最重要的东西，对各项工作都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因而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我们学习和贯彻《决议》中必须紧紧把握住的。



应把“我”改为“他”

钟俊德

高中语文第一册《装在套子里的人》中有这样一段：“别里科夫跟我同住在一所房子里。我的卧室挺小，活象一只箱子，床上挂着帐子。他一上床，就拉过被子来蒙上脑袋。”全段本是描写别里科夫怎么样，但又夹了一句关于“我的卧室……”如何的描写，文意不连贯，且弄不清别里科夫是上自己的床还是上“我”的床睡觉。

查《契柯夫小说选》（下册第675—676页）原译文

是：“别里科夫跟我同住在一所房子里。我知道他在家怎样生活。……”“别里科夫的卧室挺小，活象一口箱子；床上挂着帐子。他一上床睡觉，就拉过被子来蒙上脑袋。”

课文中那一段是依据上面所录两段文字节选缩写而来。依原译文，“我的卧室挺小”一句中的“我”应该改成“他”。这样就使文意连贯，而不致使人误以为别里科夫上了“我”的床了。